

【文学与艺术研究】

杜甫华州去官是弃官还是流放？*

张起 邱永旭

摘要:杜甫华州去官长期以来均遵从历史定评,即“弃官逃荒说”。这种说法来自《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杜甫本传,但两书所载皆有重大缺漏,故此说实为谬误。杜甫本出自肃宗一派,但在房琯事件中,他从儒家伦理出发,反对肃宗清洗旧臣,以疏救房琯表达对玄宗的支持,继而引发对肃宗擅自继位的质疑。因此,杜甫被肃宗罢官,再流放陇蜀,直至代宗继位,才得以复官。杜甫为“尊者讳”的三首“杜鹃诗”即为佐证。

关键词:杜甫;华州;罢官;流放;考释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11-0137-10

一、问题缘起

华州去官是杜甫人生中的重要关捩,诗人遭遇的苦难无不由此而起。经历这一事件后,杜甫的诗风也为之变,由明丽直截变含蓄隐讳,许多事在诗中不能直说,只能寄托遥深,被迫沉郁顿挫。自宋代出现“去官说”后,递相祖述至于今,影响深远。比如在学界影响较大的陈贻焮、莫砺锋,在各自的《杜甫评传》中也以“弃官说”为圭臬。但笔者越认真读杜甫诗,越觉得这种说法令人生疑。此事关涉诗人事君交友、生平出处大节,甚至可以说它影响了诗人后半生的运程,对解读杜甫诗至关重要。因此对这一疑案加以考证很有必要。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杜甫华州去官,是因关中饥荒主动请辞,还是肃宗进一步加责免除?到底是弃官,还是罢官?他入陇蜀,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还是被迫流放?从他与肃宗的微妙关系看,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华州去官,古今学者几众口一词,认为是他主动

弃官。但笔者认为杜甫并非这种人。他很忠君、很重传统,“奉儒守官”,报效朝廷,是其家族传统。天宝十三载(754年)杜甫作《进雕赋表》自述“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祖父文采风流,“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天下学士到如今而师之”^{[1]2172}。杜甫家族门风清华,儒学世家,世代官宦。奉儒守官,成为他一生的追求。传统道家的逃逸、魏晋名士的个人解脱以及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迂拙,都与他无关,家族传统中无这些基因。他坚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理想,自比“稷与契”,述志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已表明其人生态度。莫砺锋认为:“就杜甫一生的行事来看,‘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他产生的主要影响绝不是‘积极地营谋官职’,而是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2]如果没有外力逼迫,他怎会无端辞官?

杜甫华州去官之前的行为已表明,他是一位忠君爱民的诗人。天宝十五载,安禄山攻陷长安,玄宗奔蜀,肃宗灵武接位,杜甫迁家鄜州,北上勤王,途中陷贼军,困于长安,作《哀江头》,有“少陵野老吞声

收稿日期:2022-07-20

* 基金项目:成都大学天府文化研究院“天府文化研究与文创课题”项目“唐诗夜航”(TYB202201)。

作者简介:张起,男,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教授(四川成都 610106)。

邱永旭,男,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南充 637009)。

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之语。后来,他冒死窜奔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如此危境,忠勇的诗人都经历了,怎会因饥灾弃官呢?在华州他作有批评肃宗的《洗兵马》、描写战乱和百姓苦状的“三吏”“三别”,他怎可因饥荒便弃华州百姓独自逃荒?杜甫刚到华州,即埋头工作,作《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代州牧写《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分析形势,仇注云“经国有用之文”。这一时期他还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写李嗣业安西兵马过境讨安庆绪,“竟日留观乐,城池未觉喧”为王师讨贼而高兴。《夏日叹》《夏夜叹》记录了邺城三月兵败后关中久旱无雨的景象,人祸天灾,生灵涂炭,满目萧条,诗人“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化用陆机《为周夫人赠车骑诗》“对食不能餐,临觞不能饭”,忠君忧民之状溢于言表,毫无辞官之志。从其价值观与道德人品来看,他不可能弃官逃荒。所以,“弃官逃荒说”纯属无稽之谈,颇不合诗人家庭传统、人生理想及为人处世。

翻检近年研究杜甫的文献,杜诗研究虽为“显学”,但相比而言,对于华州去官问题却鲜少追寻,囿于定说。早期如 20 世纪 80 年代郑文《杜甫为什么弃官》、冯钟芸《关于杜甫弃官往秦州缘由新探》,到近年丁启阵《论杜甫华州弃官的原因》、安志宏《“少陵弃官之秦”探因——关于杜甫弃官流寓秦州的补充意见》、陶成涛《杜甫弃官奔秦州原因再探析》、师海军《杜甫离职华州西行论稿》均从宋人之说。这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多是就弃官原因分析,未能上升到罢官这一层面。如冯文史料运用非常详尽,可惜仍在旧说里转圈子。郑文既有退隐之志分析,又有罢官猜测,惜无结论,便有些模棱两可,在文末说明:“由此可见所谓诗人的弃官,并非由于天灾饥饿,而是由于人事排斥,本诗自道明甚。以上所举,理由还不够充分,证据还不够切实,请候高明,作进一步之探索。”陶文则把杜甫说成忧惧战争而逃亡,将诗圣视为偷生之辈,而无视其忠勇。文中将杜甫代宗广德二年(764 年)在蜀中所写的《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中的“不关轻绂冕,但是避风尘”之句,肤浅地理解为字面的“躲避战争风尘”,不明白诗人为尊者讳的苦心,说“杜甫担心叛军再次攻入潼关,担心华州再次沦陷,故而提前弃官西逃”。师文是新近的研究成果,却又回到宋人弃官旧说,进一步分析了“主动辞官”的原因,认为诗人离职华州

西行及其在秦州的经历是去找人,是为了去凉州投奔河西节度使杜鸿渐。这属于主题先行式写作,完全不可取。

21 世纪初有人提出“华州罢官说”,如阎琦《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王勋成《杜甫罢官说》、李宇林《杜甫罢官华州原因探析》、韩成武《解说“罢官亦由人”之“罢官”——对杜甫离开华州任原因的讨论》,但在分析原因时,要么牵强附会,要么与弃官原因大同小异。如李文虽然说华州“罢官”,却认为是因为杜甫身患重病,难以应付繁重的公务而遭“顶头上司”罢官。韩文认为“罢官”有两义:一是当事者主动辞掉官职;二是当事者被免除官职。杜甫离职属前者,是对肃宗政治失望而自己罢自己的官,实际上仍等于“弃官说”。阎文虽认可罢官,却说诗人是因“荒怠政务”中途擅离职守跑回河南“触犯职律”而遭遇罢官。这种看法没有理解诗圣之心,与历代对诗圣的认知严重不符。王文认为杜甫罢官是因为唐代考官制度,秩满罢官,是“缓解选人多而官阙少这一社会矛盾的一项措施”。这里把杜甫看成普通平民士人,与杜甫家世身份不合。王文看似另辟新路,实际上却不可取,此时是盛唐而非中晚唐,官路未见堵塞,只有中晚唐科举放开,平民士人大量出现,才使得进身之路十分拥挤,而朝廷提供的岗位又不能满足需求。

“罢官说”虽然比“弃官说”有所进步,但仍然未能看清杜甫遭遇流放的真实遭遇。研究杜甫,都知道“华州事件”对解读诗人后期诗歌的重要性,但对这一事件的认知如果上升不到“流放”的程度,则难以解释透彻杜诗,难以解释清楚杜诗前后诗风的重大转变。不知杜甫遭遇流放,导致今人对其草堂诗的误解。不少人对诗人经历丧乱之后,在成都获得表面平静生活的诗歌作闲适写景解读,完全低估了草堂诗的价值。比如《草堂即事》,就并非写景诗,其中“寒鱼依密藻,宿鹭起圆沙”之句埋藏着诗人对朝廷、对君王的深切眷恋。杜甫在草堂诗中大量引用《离骚》《诗经》中的典故,即可知其自比屈子之难。又如肃宗上元二年(761 年)杜甫在成都所作《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表面在写风雨摧拔楠木之景象,实则是在写宫廷斗争的血雨腥风。“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暗示了诗人对失势玄宗的同情。读者如果不知诗人介入的深浅,便不知诗人心中的滴血。《读杜心解》说“深痛摧埋失色”,叹楠

树，亦是诗人遭遇流放的自叹。

二、多种典籍对杜甫华州去官的误载

关于杜甫华州去官之事，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仇兆鳌考订朱鹤龄《杜工部年谱》中所说：“乾元二年己亥，春，自东都回华州，关辅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3]¹⁶二是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所说：“乾元二年己亥（759），公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4]⁶⁹三是王士菁《杜诗今注》中在《立秋后题》下注：“这首诗约为乾元二年盛夏已过，立秋后辞去华州司功职务，即将前往秦州时所作。”“罢官二句”下注：“这是说去官之意完全由自己决定，心不为形所役。反陶诗之意而用之，以明去官之志。”^[5]以上不同时期的说法皆从主动“去官说”，均把“华州事件”简单化，殊不合诗人的理想抱负。

追本溯源，杜甫华州“弃官说”出自两《唐书》。《旧唐书》文苑本传记载：

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椽，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6]³¹⁹³

《新唐书·杜甫传》记载：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郾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庭兰罢宰相。甫上书，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庭兰托馆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觐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

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窶，孱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畿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7]³⁵⁸⁸⁻³⁵⁸⁹

但两书均距杜甫生活的时代较远，不能说最权威，并且两史杜甫本传皆有重大缺漏。《旧唐书》言“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文义不连贯，从华州参军直接跳到寓居成州同谷县，中间有重要信息脱漏，故意漏言杜甫“寓居成州同谷”之因，似有隐情。《新唐书》则径直言“关畿饥，辄弃官去”，明确说杜甫为饥荒弃官，去过不受约束的自在日子。比较两书，《旧唐书》并无“弃官”二字，100多年后编纂的《新唐书》中添加“弃官”二字，让人殊难理解。危急关头，一贯为苍生号寒啼饥的杜甫会抛弃自己一直关心的黎庶，不负责地弃官逃跑，去过“负薪采橡栗自给”的生活？这不仅严重违背他“奉儒守官”的家训，而且与他后来在成都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展现的儒家情怀相悖。从杜甫一贯的立身行事来看，他不会如此前后人格分裂，“华州逃荒”几不可能。

追而溯之，《新唐书》的“弃官说”盖源自宋人王洙《杜工部集〈记〉》介绍杜甫生平时所说的“属关畿饥乱，弃官之秦州”。“逃荒说”则是王洙根据《旧唐书·肃宗纪》中关中灾荒的记载，增补杜甫弃官的原因是“关畿饥乱”。王洙的记载误导天下人千年，并引起后人对华州之后大量杜诗的误读，至今未得到匡正。

三、杜甫华州去官的真相

杜甫华州去官之因是什么？《旧唐书》不便写出，直接略去；《新唐书》说是“弃官”；杜甫自己也刻意回避。从杜甫自身而言，他具有忧念百姓的情怀和济苍生安黎元的抱负，并且这种志向老而弥坚，他无论如何不会坐视人民苦难主动辞官。天宝十四载（755年）他担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年后，回奉先省亲，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充分表达自己坚定的志向与抱负：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

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仇兆鳌注曰:

(第一至八句)此自叙生平大志。公不欲随世界立功,而必朝圣贤事业,所谓意拙者,在比稷契也。甘契阔,安于意拙;常觊豁,冀成稷契。^{[8]259}

(第九到二十句)此志在得君济民。欲为稷契,则当下救黎元,而上辅尧舜,此通节大旨。江海之士遗世,公则切于慕君而不忍忘;廊庙之臣尸位,公则根于至性而不敢欺。此作两形,以解同学之疑。浩歌激烈,正言咏怀之故。明皇初政,几侔贞观,迨晚年失德,而遂生乱阶。曰“生逢尧舜君”,望其改悟自新,复为令主,惓惓忠爱之诚,与孟子望齐王同意。^{[8]259-260}

(第二十一句到第三十二句)此自伤抱志莫伸。既不能出图尧舜,又不得退作巢由,亦空负稷契初愿矣。居廊庙者,如蝼蚁拟鲸,公深耻而不屑干。游江海者,若巢由隐身,公虽愧而不肯易。仍用双关,以申上文之意。放歌破愁,欲藉咏怀以遣意。^{[8]260}

杜甫要求自己向稷、契看齐,为了此志,即使落得一生勤苦、一事无成,也不愿转移志向。虽然他惭愧没有像许由、巢父飘然世外,但不愿改变节操。所以,杜甫不可能辞官逃跑,其华州去官另有原因,笔者认为是他与肃宗的君臣关系出现了问题而被罢官。《旧唐书》不记去官原因,是受为尊者讳的史传传统约束。杜甫自己避而不谈,也是在为尊者讳。

综观杜诗,杜甫仅在《立秋后题》这一首诗中非常隐晦地提及华州罢官之事: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这首诗是乾元二年(759年)立秋次日作。杜甫此前所作忧国忧民的《夏日叹》《夏夜叹》均无辞官的迹象。立秋次日即言“罢官亦由人”,可见罢官是

在立秋日。“节序昨夜隔”,暗示昨日还在官,隔夜就被罢免。“日月不相饶”,除时序更迭外,背后还有日月力量。日月代表着谁,诗人没有说。他是别有一番痛楚不能说,此乃春秋笔法。我们联想这一时期李白流放夜郎时所作《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十》中的“双悬日月照乾坤”之句,可以推知,日月分别指玄宗和肃宗。“日月不相饶”不能单纯解为化用鲍照诗句“日月流迈不相饶”,而是一语双关,还隐含着鲍照下句“令我愁思怨恨多”,由此可知诗人对罢官多么痛苦不堪。

《杜诗详注》中朱鹤龄、王嗣奭、仇兆鳌对这首诗的解释皆失误,所谓“此诗盖欲弃官时作”“乃公转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矣”^{[9]544},均是不解诗人之遭遇。其实杜甫在诗题中直接点明这首诗立秋后作,是别有深意的。古代设官立制、刑杀赦免均要依节序,应四时。《礼记·月令》载:“孟秋之月……用始行戮。……以征不义,诛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10]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下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11]杜甫在立秋之日被罢官,隐晦地道出肃宗迫不及待地对他秋后算账。

翻检杜诗,可以发现杜甫对于涉及自己重要人生关节的诗全有自注,唯独《立秋后题》这首没有,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在为尊者讳。这种良苦用心,在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乾元元年(758年)杜甫由长安出华州途中作《题郑县亭子》,也在“为尊者讳”,诗中有“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之句。诗人为谁伤神?他苦楚难言,自己的遭遇不可留于“青竹”。又如五年后他在蜀中写的《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中有“不关轻绂冕,俱是避风尘”之句,谈到当年被驱赶出朝、华州罢官时,也是十分含蓄隐讳,完全把责任归于自己。尤其是“败亡非赤壁,奔走为黄巾”两句,既隐含安史之乱,又映射肃宗擅自接位、架空父皇的不孝行为。晚年他在总结性长诗《壮游》中也刻意回避关涉自己人生大节的华州罢官事不记,仅言“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前句暗指诗人当年任左拾遗时激烈批评肃宗的行为;后句暗示华州之难及流放陇蜀的遭遇。担任左拾遗却

不能进谏,反而被放逐边荒之地,诗人故意跳过其中的原因与过程不言,只能“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值得注意的是,杜诗中有许多带“病”字的句子,这往往并非指身体之病,多数情况下应当理解为君臣之病。他所“病”之人,是罢官背后的强大势力,也就是诗人“为之讳”的唐肃宗。我们从“罢官亦由人”之句可知,杜甫不是简单贬谪,而是被革职。因政治打击而直接罢官,惩罚过于严重,之后像永贞之变这样扰乱朝纲的重大政治事件,当事人也仅是被长期贬逐。由此可见,杜甫与肃宗之间的恩怨已超越房琯事件。

四、杜甫与肃宗的君臣关系

杜甫与肃宗的君臣恩怨,我们可结合史料梳理出二人交集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一是杜甫与肃宗二人的关系始于天宝十三载(754年)。

《新唐书·杜甫传》记载:“天宝十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7]3588}天宝十三载十月杜甫守选期满,授河西尉。河西县属同州(陕西渭南),为春秋时期游牧部落大荔戎进入洛水建立的戎国之地。这与诗人的正统观念不合,他并未像一般寒士考选出来那样去就职,于是再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在《官定后戏赠》题下自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左右卫率府参军为太子武官,掌兵仗羽卫,设仓兵胄三曹参军,从八品下,官阶不高。《新唐书》称杜甫“胄曹参军”有误,《旧唐书》称“兵曹参军”是准确的。杜甫在这个岗位履职一年多,有多首与官员交往的诗可以为证。这一年他还得到休假,多次往返奉先(陕西蒲城)探亲。从杜甫的《夏日李公见访》一诗可知,太子曾委派家令李炎去看望杜甫,从中亦可推知杜甫与太子的关系比较密切。

杜甫做了一年率府参军,到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他又从京城赴奉先探家,写下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笔者细致阅读杜集,发现杜甫履职一年多后才回奉先探亲。不少学者读书时误将天宝十三载这年省去,认为天宝十四载杜甫官定后即回奉先探亲。如果按今人观点,至少有11首杜诗无法编年,杜甫北上勤王,而不追玄宗入蜀的行动,

也不能准确解释。

二是至德二载(757年)春,杜甫自长安亡走凤翔,五月十六日授左拾遗,受到肃宗器重。

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二《述怀》注:

唐授左拾遗语:“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命中书侍郎张镐赉符告谕。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右敕用黄纸,高广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许。年月有御宝,宝方五寸许。今藏湖广岳州府平江县裔孙杜富家。^[12]

宣义郎,散官衔,从七品下;左拾遗,职事官,从八品上。杜甫由兵曹参军改左拾遗,属升迁。左拾遗虽为从八品上,却是天子近臣,“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利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13]。肃宗把如此责任重大的职位交付于杜甫,可见对他充分信任。杜甫左拾遗的任命由中书、门下二省奉皇帝敕诏颁授,比吏部铨选授官更为尊荣。左拾遗为敕授官,由皇帝授予;旨授官由吏部铨选上报,再下旨颁授,人选并非出自皇帝。可见此时肃宗非常器重杜甫,君臣关系融洽。

光复后杜甫回到长安,肃宗曾给予他很大恩遇。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载,“乾元元年戊戌,公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上亲享九庙,公得陪祀”^{[4]68},可谓荣显。仇兆鳌注:“唐史肃宗还京,在至德二年十月,其亲享九庙及祀圜丘,在乾元元年四月。”这种莫大的荣耀给杜甫留下美好记忆,晚年他还在《往在》中述此盛事:“微躯忝近臣,景从陪群公。登阶捧玉册,峨冕耿金钟。侍祠慙先露,掖垣迩濯龙。”至德二载五月,杜甫作感恩诗《端午日赐衣》,可见君臣之间往来密切。

三是至德二载闰八月初一,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被遣返郾州省家,君臣关系开始疏远。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记载:

至德二载丁酉,公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琯得罪,公抗疏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

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4]65}

乾元元年戊戌,公四十七岁。任左拾遗。……六月,房琯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琯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4]69}

《旧唐书·房琯传》记载:

上由是恶琯。……宪司又奏弹董庭兰招纳货贿,琯入朝自诉,上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干预人事。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言琯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6]2076}

房琯五月十日被贬为太子少师,杜甫五月十六日授左拾遗。因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之交,杜甫向肃宗“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甫谢,且称:‘琯宰相子……酷嗜鼓琴,庭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倚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然帝自是不甚省录”^{[7]3588}。

“墨制”是指皇帝避开中书、门下二省用墨笔亲书诏令。肃宗不经外廷盖印就直接向杜甫下达亲自书写的遣返诏书,说明他对杜甫非常生气,很有可能在廷上匆匆草就。杜甫对这一突然下达的诏命毫无思想准备,感到茫然失措。但他在被遣送鄜州省家路上作长诗《北征》,仍在忧虑国事、忧君失误,东坡称赞“《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3]406}。在杜甫看来,只要正义就要坚持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但在肃宗看来,这种做法不仅违背圣心,更是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了。

乾元元年,肃宗出贾至汝州,贬房琯邠州,下除高适太子少詹事,刘秩、严武等均被逐。朝中发生这么多大事,不少旧臣受到处理,身为谏官,杜甫感觉自己有谏诤的责任。正如其《题省中院壁》所云:“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袞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他认为,如果谏官无忠言以补天子,便是愧对皇恩。

杜甫初为谏官,便以房琯罢相之事上疏,这触犯了肃宗内心的禁忌。肃宗先登基再通告玄宗的做法有违儒家血缘伦常,他要借贺兰进明谗毁房琯之故

罢免房琯以平息非议。房琯罢相是肃宗对玄宗旧臣有计划的清洗,杜甫却抓住此事上疏力抗,由此得罪肃宗。这并不是杜甫迂腐,而是他看清了肃宗面目后的深思熟虑之举,是其一贯的忠勇正义的行为。他知道房琯恢复相位已不可能,但他偏要不可为而为之,这并非不合时宜,而是要表明态度,阻止肃宗继续迫害大臣和上皇。广德元年(763年),他在《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仍说“太子即位,揖让仓卒”,委婉批评太子继位违背伦常。《旧唐书·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七月“是月甲子(十三日),上即皇帝位于灵武”。《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十五载八月“癸巳(十二日),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十六日),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也就是说,天宝十五载七月肃宗即位灵武,玄宗八月才知情,有一个月的时间天下有二主。杜甫的清醒,正是肃宗惧怕的。因此,在同年闰八月初一,杜甫被肃宗墨制放归鄜州省家。由此开始,他与肃宗渐行渐远。从《北征》“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之句看,他内心对皇帝的疏远感到惶恐不安。

杜甫直言极谏的执着,让肃宗烦恼,因为这样对自己清除旧臣、树立权威不利。当时上皇还健在,旧臣与之多少有瓜葛往来,这是肃宗心病,必须处理。乾元元年杜甫出华州后,同年八月肃宗又将李白流夜郎。当时被处理的官员基本上不是玄宗旧臣,便是永王李璘之人,唯有杜甫出自东宫,但他却没有站在肃宗阵营。他去京时作《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残破胆,应有未招魂。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时值朝廷用人之际,自己却遭受贬谪,由此更可看出他内心的无限悲凉。此诗仇注引元人赵沍《杜诗选注》:“公虽遭谗黜,而终不忘君,……岂为一身计耶?”又引清人顾宸《杜诗律注》:“此公事君交友、生平出处之大节。曰‘移官岂至尊’,不敢归怨于君也。当时谗毁,不言自见。”^{[3]481}杜甫一生遵从君臣大义,无只字怨君,只能自嘲“不怪君王,怪我才不合道”。诗人从此以后,再没有回到长安。

四是至德二载十一月杜甫自鄜州归京,继续任

左拾遗，至乾元元年六月突然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君臣关系恶化。

杜甫出京前，作《酬孟云卿》，“但恐天河落”之句暗含被贬的原因。是年肃宗处理大批旧臣，笔者推测他又会上疏阻拦。他在朝廷目睹肃宗对上皇不孝的做法，刚到蜀中便以春秋笔法写下《杜鹃行》，微言大义对肃宗进行含蓄的批评和质疑，可见他立场之鲜明、态度之坚决。

君臣关系是封建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左迁华州后杜甫也可能托人做过疏通，努力修复君臣关系，但没有成功。杜甫有《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特意注明“冬末以事之东都”，至于何事，诗人没有详说。杜甫诗集是诗人自编，他在编订时对自己重要的人生关节，都有“自注”，由此可见“之东都”一定不是小事，如仇兆鳌所言“此公生平事君交友立朝大节也”^{[3]25}。按人之常情推测，当时诗人内心最焦虑的应该是修复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有《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为证。杜甫在冬至怀念同事及左掖生活，流露出对过去朝中生活的无限眷恋，以及对当前处境的愁闷。怀念同僚在很大程度上是怀念朝廷。此时，杜甫被贬华州已有半年，但君臣关系没有缓和的迹象。在湖城（河南灵宝）刘颢宅宴上，他醉酒作诗“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款曲”须互通，“艰难”尚努力。他期盼“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但只有“天开地裂”才能沟通长安之路，这实在太难。“岂知驱车复同轨，可惜刻漏随更箭”，时过境迁，合辙难求，暗喻君臣关系难以修复。但当他从洛阳转回华州不久，却被无情地罢官了。估计肃宗得知有人求情后，更为发怒。

乾元元年冬末，他急于往东都见何人？依笔者推测，很可能是高适。刘开扬《高适年谱》记载：

758年，戊戌，肃宗乾元一（至德三）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高适五十五岁。贬官为太子少詹事，赴洛阳。适后有《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五月，过睢阳，有《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夏日，在洛阳，有《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章甫）所居》诗。又有《送崔录事赴宣城》《送桂阳孝廉》，似亦洛阳之作。

759年，己亥，肃宗乾元二。高适五十六

岁。五月，出为彭州刺史，有《赴彭州山行之作》。于蜀山中为乱军劫夺。九月，史思明入洛阳。十月，引兵攻河阳城，李光弼率诸将败思明将周挚，擒徐璜玉等，思明遁去。十一月，适有《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又《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亦是年冬作。至彭州，有《谢上彭州刺史表》。十二月有《赠杜二拾遗》诗，时杜甫初至成都，寓居草堂寺中。^[14]

由上可知，杜甫去洛阳时，高适正以太子少詹事的身份分司东都。他有可能是去求高适帮忙，去之前特意写了《寄高三十五詹事》，中有“时来如宦达，岁晚莫情疏”之语，但从“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来看，他还没有收到高适的回信，所以他直接去洛阳求见。在洛阳，高适很可能答应帮助他，故乾元二年年底，杜甫一到成都便收到高适的《赠杜二拾遗》，得到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佛香时入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草玄今已毕，此外复何言”。这相互形成的锁链，或可解“冬末以事之东都”之谜。当然这仅仅是根据杜甫与高适关系的推测，能否成定论，尚待新材料进一步考论，此处只是抛砖引玉。

五是乾元二年（759年）立秋，杜甫毫无征兆地去官。

杜甫华州去官，后人皆言“公有高蹈之志”，因其与朝廷不合作的态度。但笔者认为，“高蹈之志”与他不符，杜甫不是道家人物，也没有杂家思想，他是纯儒。即便流放秦州，他仍有《蕃剑》述志：“致此自僻远，又非珠玉装。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越，龙身宁久藏。风尘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是年，贬邠州一年的房琯被召回，“诏褒美之，征拜太子宾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礼部尚书”^[15]。贬巴州的严武也在上元元年（760年）迁东川节度使，次年擢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可见，肃宗对琯党的处罚并不严，是给了出路的。

但杜甫则不同，这一年他反而彻底失官了。为什么？因为在华州他坚守初衷，仍在含蓄地批评肃宗。如《洗兵马》作于邺城大战前，当时王师已扫清外围，诗人对未来河清海晏充满期待。但我们仔细品味相关诗句，可以发现，诗人并不止于“赞”，而是明“颂”暗“刺”，明“赞”暗“讽”。经历华州之贬，遭

受切肤之痛,杜甫已经深知肃宗为人。由“鹤禁通宵风鞞备,鸡鸣问寝龙蛇晓”之句,开始转向“刺”。实际上玄宗自蜀还京后从未有如此待遇,诗中故意这样描述岂不是“讽”?“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之句再提房琯事,又是明“赞”暗“讽”。萧丞相、张子房分别代指房琯、张镐,二人都有辅宰之才,但都被罢相了。“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之句,更是在讽刺肃宗不明忠直之臣,随意刑罚。此诗虽然是颂诗,但诗人没有“空颂”,对肃宗有美有刺。“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与“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形成鲜明对比,揭示肃宗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肆意赏赐自己人,处理父亲旧臣时却十分残酷。末句“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表达了对肃宗治国的强烈否定。《钱注杜诗》云:“《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谦益感受到了诗人之心,明确指出:“此公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则以房琯之生平,为唐史抹杀,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16]67}肃宗显然也感受到了《洗兵马》中诗人的良苦用心,因此很快将其罢官。环视琯党成员,尤其是朝廷高层,唯有杜甫坚守君臣大体,秉持忠义之气,容不下破坏人伦秩序的事。所以,称杜甫是唐代的孔子,称杜诗是“诗史”,皆是中肯的评价。

六是上元元年(760年)杜甫被流放成都,作三首“杜鹃诗”谴责肃宗。

在蜀地时,杜甫罢官已过数月,仍不能释怀,作《杜鹃行》,借古蜀神话追记肃宗不尽人子之道:

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跳枝窜叶树木中,抢佯瞥捩雌随雄。毛衣惨黑貌憔悴,众鸟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栖华屋,短翮唯愿巢深丛。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饥始得食一虫。谁言养雏不自哺,此语亦足为愚蒙。声音咽咽如有谓,号啼略与婴儿同。口干垂血转迫促,似欲上诉于苍穹。蜀人闻之皆起立,至今教学传遗风。乃知变化不可穷,岂知苦日居深宫,嫫媿左右如花红。^{[12]636}

上元二年(761年),杜甫再作《杜鹃行》: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工窳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

区。尔惟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复何所无,万事反复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12]116}

《钱注杜诗》云:

上元元年七月上皇迁居西内。高力士流巫州,置如仙媛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皇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诗云“骨肉满眼身羁孤”,盖谓此也。移杖之日,上皇惊,欲坠马数四。高力士跃马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又令辅国挽马,护持至西内。故曰“‘虽同君臣有旧礼’,盖谓此也。”^{[12]117}

大历元年(766年),杜甫在云安(重庆云阳)再作《杜鹃》。此时代宗已即位,努力纠正父亲错误,拨乱反正,以工部员外郎召还杜甫。《杜鹃》乃是杜甫还京途中写给代宗的颂诗。杜甫之所以去蜀,是因为他要赴京受职。《年谱》此处说严武暴卒后杜甫失去依靠去蜀,完全错误。全诗如下: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馀,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今忽暮春间,值我病经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12]168}

这三首“杜鹃诗”均采用了“诗史”笔法,深含春秋隐意,以蜀人悲杜鹃啼血,杜宇禅位传说,托寓上皇与肃宗之间的恩怨。作前两首时,肃宗在位,杜甫虽在流放中仍坚持批评。他即使远离政治中心,也心系朝廷,堪称唐代屈子。最后一首作于代宗时期,诗旨已完全不同。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宝应元年(762)建巳月:“甲寅(五日)上皇崩于神龙殿。……丁卯(十八日)上崩。”^[16]由此可知,大历元年的《杜鹃》是写给代宗的赞美诗。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沉郁顿挫”是一种贵族情怀,“顿挫”即上下有序、尊卑错落的儒家社会秩序,如“行飞与跪乳,识序与知恩”。诗人此时已获代宗启用,正还朝接受郎官,遗憾“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一片忠谨之意。此诗写于去蜀后病阻云安,不能进京报天子恩遇,正是“顿挫”之诗。

可惜,国内学者对“顿挫”的理解存在不小的误解。

对比前两首,第三首“杜鵑诗”在赞美代宗的同时,也是在谴责肃宗,一褒一贬,诗人多么深婉顿挫。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逻辑:杜甫疏救房琯是表象,反对肃宗清洗旧臣才是目的。他以疏救房琯表达对玄宗的支持,也就引发对肃宗擅自继位的质疑。杜甫最重儒家血脉亲情,将违背伦常看作“乱源”,在华州他以《洗兵马》批评肃宗不孝,这些做人原则,无论是杜甫担任左拾遗期间,还是在华州参军任上,都是他实现“再使风俗淳”的社会理想所要坚持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遭到肃宗步步迫害。杜甫忧心如焚的“乱世”,包含两方面:一是安史之乱,二是人主不尽孝道。百善孝为先,讲的是秩序;万恶淫为首,说的是乱的根源。这两条肃宗与安禄山都触犯了。大逆不道与忤逆不孝,皆是违背天下秩序之祸首,这是杜甫终身批判的,所以他自然也不会见容于肃宗。但杜甫又特别尊崇君臣礼义,不能直接谴责皇帝。即使肃宗强逼玄宗退位的事实也不能提,只能将一腔忧愤化为疏救房琯的抗颜直谏。杜甫之心,别人不知,肃宗却会感知,故有罢官处罚。诗人之苦,“后世罕有知之者”。这就是肃宗对所有“琯党”都予平反,唯独不放过杜甫的根本原因。在华州,他“独立万端忧”,却讳言不能述。

五、华州罢官后杜甫遭遇流放

杜甫华州罢官后,他去往何处,为何不能回长安呢?这又是一个关节问题。他不能回去,一如“罢官亦由人”那样无奈,这是流放,去哪里由不得他,自然未能再回长安。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云:“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其中“因人作远游”已隐讳道出他遭遇了类似屈原那样的放逐,这是关乎他日后成为“诗圣”的重要内在因素。

关于流放的去向,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这样分析:“是时东都残毁,既不可归,长安繁侈,又难自存。”并举杜甫在秦州时所作《寄高岑三十韵》中的诗句“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为证,认为居秦州是因其侄杜佐居东柯,那里雨水充足,“秋禾有收”,“因携家徙居焉”^{[4]169}。闻氏延续《新唐书》的“辞官逃荒说”,故有“惟秦州得雨”适合居家的认识。这种认识将诗人遭遇放逐简单化地理解为为了

生存,没有明白“无钱居帝里”乃诗人采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得雨”,真是秦州有大自然之“雨”吗?真是为了生存去秦州吗?这只是字面意思,笔者以为必须回到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看问题,从君臣关系分析中找到隐含的答案。

杜甫华州罢官后,皇帝为何不让归京?原因很简单,怕他回京生事端,议论自己清洗旧臣、稳定政权的策略。长安不准回,杜甫只能流去秦州,故才有“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之叹,一种无奈莫可言述。杜甫的流放是被指定去处的,秦州自汉代以来即行役戍边的苦寒之地,羌戎杂居,杜诗称其为“天末”,指中原之外,即为天边,有惩罚之意。他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中形容秦州“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和杜甫一样被放逐秦州的,还有长安高僧赞上人。二人交往频繁,相互慰藉。杜甫写过三首诗送他,其中《宿赞公房》自注“京中大云寺主,谪此安置”,诗人自己又何尝不是被“谪”呢?仇注引赵沅《杜诗选注》:“赞,亦房相之客,时被谪秦州。”^{[9]592-593}两相参证,二人均“因人”“因事”去秦州,或为肃宗的统一安排。

到秦州不久,杜甫又被迫前往两百里外的同谷。他在《别赞上人》中感慨“我生苦飘荡,何时终有终极”,他不愿再流,可肃宗迫害又至,不知何时会停止。他在《发秦州》中说“生事不自谋”,“惘然难久留”,这些奔波都不是自己的本意。在同谷他有《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其中“中原无书归不得”之语感叹命运难自主。入蜀也是肃宗的安排,杜甫有《发同谷县》,“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忼忼去绝境,杳杳更远适”深含微意。诗人由华州到秦州转同谷再到蜀中,故言一年“四行役”,离京城越来越远。谁役使他?诗人没有说,我们不难推测应是肃宗加害。以上推论可知,华州去官非本愿,秦州流放属无奈,入蜀也非他自主决定。此时正逢国家多事之秋,用人之际,不反对肃宗的王维、岑参均在数月内得到迁升,杜甫却一步一步远离政治中心。由此可见,他与肃宗的君臣关系不是一般糟糕,这是导致他被罢官的根本原因。

后来,杜甫又补京兆府功曹。《旧唐书》载:“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新唐书》载:“召补京兆府功曹参军,不至。”朝廷召补杜甫京兆府功曹在何年?从肃宗对他的态度来看,应在肃宗驾崩后,代宗宝应元

年征召。杜甫有《奉寄别马巴州》自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宝应元年(762年)七月杜甫送严武至绵州,严武还朝任京兆尹,即为他请此官。因吐蕃滋扰,杜甫应召阻滞阆州,无法出川。广德二年(764年)正月,严武再督川,改请节度参谋。杜甫十分欣慰,写下《奉待严大夫》,从“一生襟抱向谁开”之句看,只有严武最了解他的志向。

杜甫虽然遭遇流放,历经苦难,但他始终没有怨君失志。在同谷,他有“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的号呼,声明自己不弃理想,不做清流。流放蜀中时,他不怨天尤人,反而诗思壮阔。《赠蜀僧闻丘师兄》中云“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他对皇恩只有感激,无个人怨怩。在苦难中,他没有颓废,从“穷愁一挥泪,相遇即诸昆”“漠漠世界黑,驱车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的诗句中,可见少陵旷怀。

杜甫遭遇罢官流放,千载无人言述,无论钱谦益还是仇兆鳌,或许没有意识到,或许故意疏忽。我们抽丝剥茧发现其中真相应该是:在古代血缘伦常政治中,人伦忠孝是执政之基,杜甫对于肃宗不敬上皇、违背伦理,及由此引发对肃宗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戳中了肃宗的痛处,导致他受迫害,在所有瑄党平反后,他反而被罢官流放。但《新唐书》与《旧唐书》均为尊者讳言,使“诗圣”之痛苦千古沉冤。

综上,杜甫华州去官实为“罢官”,再流放陇蜀,直到肃宗驾崩,代宗继位,他才在严武的大力举荐下得以复官,相当于获得朝廷正式平反。这期间,杜甫有四年时间无官职,以后又经幕府参谋、蜀中军功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入朝就职。终因途中消渴病发,被阻夔州,但他仍赤心不改,期待还朝。诗人因糖尿病销蚀身体,不能还朝履职,最后在一条孤舟中带着无

尽遗憾与忧伤离世。

杜甫的不幸遭遇,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的“诗圣”地位。正是因为华州罢官,流放陇蜀,杜甫后半生诗歌转入春秋笔法的隐讳,成为“诗史”。诗人的不幸遭遇强化了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这里说一下笔者对“诗史”的理解,“诗史”决非文学史泛解的现实主义诗歌,而是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具有四个标准,一是言王事,二是语词曲折意含褒贬,三是让乱臣贼子惧,四是为尊者讳。我们理解杜诗中称为“诗史”的诗,当围绕这些标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华州罢官,陇蜀流放,成就了“诗史”,成就了这位五百年一遇的伟大诗人。

参考文献

- [1] 仇兆鳌. 杜诗详注, 第 5 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 莫砺锋. 杜甫评传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3.
- [3] 仇兆鳌. 杜诗详注, 第 1 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4] 闻一多. 唐诗杂论: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5] 王士菁. 杜诗今注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9: 240.
- [6] 刘昉等. 旧唐书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 [7] 欧阳修, 宋祁等. 新唐书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 [8] 仇兆鳌. 杜少陵集详注, 第 3 册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9] 仇兆鳌. 杜诗详注, 第 2 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0] 郑玄等注. 十三经古注, 第 5 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940-941.
- [11] 董仲舒. 春秋繁露 [M]. 张世亮, 钟肇鹏, 周桂钿,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470-471.
- [12] 钱谦益. 钱注杜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13] 李林甫等. 唐六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47.
- [14] 刘开扬.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5] 刘昉等.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324.
- [16]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2499-2500.

Did Du Fu Abandon His Official Position or Was He Banished in Huazhou

Zhang Qi Qiu Yongxu

Abstract: It has long been subject to historical judgment that Du Fu's leaving office in Huazhou was that he quit and fled from famine, as was stated in the original biography of *Old History of Tang* and *New History of Tang*, but both books had serious flaws and were fallacious. Du Fu was originally in league with Emperor Su Zong, but in Fang Guan Event, out of Confucian ethics, he opposed Su Zong to clean up the old ministers and supported Emperor Xuan Zong in the manner of rescuing Fang Guan, which aroused the questioning of Su Zong's unauthorized succession. Du Fu was hence dismissed by Su Zong, exiled to Gansu and Sichuan and not reinstated in office until Emperor Dai Zong ascended the throne. Du Fu's three "Cuckoo poems" which applied with other appellations instead of the names of those respected are the evidence.

Key words: Du Fu; Huazhou; dismissal from office; exile;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 采薇